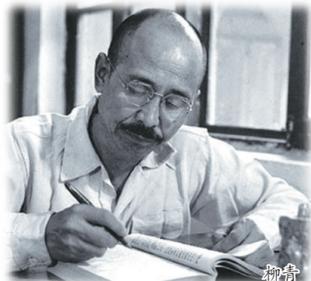


人物春秋

我和柳青书记的情缘



柳青

我向不称柳青的名字,而称他柳书记,因为他曾任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和柳青接触过四次,两次是柳书记因工作有事找我,两次是我去看望他。

第一次是1952年。柳青时任长安县委副书记,我是大兆区委书记。一天,县委办公室电话通知我,说柳书记找我谈话。接到电话,我有些紧张,因为我读过他的《种谷记》《铜墙铁壁》,知道柳书记是一位大作家。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柳书记坐在办公桌前,手指夹着纸烟在看文件,我说:“柳书记,您好。”柳书记抬起头望着我说:“你是大兆区委书记周文敏同志。”我笑着说:“是的,柳书记。听说您有事找我。”柳书记说:“是的,我想知道下面一些情况,你来谈一谈。”柳书记才来长安不久,想了解下面的情况,我是基层干部,又是一个区的负责人,于是我向柳青书记汇报了大兆区当时的工作和群众的思想动态。柳书记问得很详细,还不停地在本子上记着,他当时认真的样子,还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柳书记的办公室在县委北院的东北角,面朝南,背靠大礼堂。三间土木结构的小安间房,青砖铺地,内隔一间为卧室,外两间为办公和接待来人所。办公室布置比较简单,一张五斗桌和一把木椅,边上是两个旧沙发,一条木制连椅。柳书记说话声音较低,不快不慢,很有条理,亲切感人。

第二次是1962年。我在县委统战部主持工作,宣传副部长郭景宇同志约我去看望柳书记,我很高兴,因为多年未见柳书记,也想见见老领导了。一天下午,我们骑着自行车去皇甫。由皇甫去皇甫有两条大路,一是瓜州坡,一是皇甫坡,这两条路都比较长,也比较陡。上下坡时,我们就推着自行车走,到了平地就骑着跑。柳书记住的地方在皇甫村和罗家湾之间半坡平台上的中官寺内。我们推着自行车刚上平台,马威同志就看见了,赶紧上前招呼我们。正在院子坐着看书稿的柳书记也放下手中的书稿,站起身让我们坐下,马威同志忙着给我们倒水。柳书记问我们:“你俩咋来咧,有事吗?”我们说:“没事,时间长了,想来看看老领导。”柳书记微笑着询问我们县上近来的工作,也问他所知道的人。我们也关切地询问了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他正在赶写的《创业史》第二部的进展情况。

柳书记住房的后面有一个小苹果园,栽有十几棵苹果树,树树之间种着蔬菜。果园旁还打了一眼手压水井,群众称为“洋水车”,井水是浇灌果树和蔬菜用的。院中种有花卉,有的花还很名贵。最为特别的,是房前栽

的那棵葡萄树,枝繁叶茂,长势健壮,每逢春夏之季,柳书记常常坐在葡萄架下看书写书。

第三次是1964年冬。长安“社教”期间,通告全县所有私人枪支弹药一律上交,不能私自存放。有一天柳书记来到县委找我,看来他很急,说他有一支猎枪(鸟枪),不知是否上交,让我领他去社教总团询问,我立即陪柳书记去见社教总团领导。

1973年,组织决定派我去王曲公社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我知道后,两夜未睡着觉。当时王曲“水渗”工作难做,工作做不好,出了差错,就有人向上面告你的状,过去各大运动又都是省、县领导蹲点试点的地方,县委两位领导都说王曲有三难,“人难见、脸难看、事难办”,工作(指公购粮入仓)拖了全县的腿。后来,我又一想,有柳书记在王曲,有事

到了老领导;惊的是他消瘦了许多,精神弱了,说话有气无力,上气不接下气,但还想和我们多说几句话。他的哮喘很严重,每说两句话就要用手上的小氧气瓶给口里送气。看到他这痛苦的样子,我不由得鼻子发酸。他在文化革命中的事我们不敢问,怕他伤心。他想知道王曲的人和事,我们也不便说,怕对他的病不利。只能劝他安心养病,保重身体,待身体好了仍回王曲,王曲人民都想他了,需要我们的事尽管说,我们一定照办。当时,我们说要送些王曲的糯米鸡蛋给他时,柳书记说:“干休所有灶,啥都有,用不着,感谢你们的关心。”由于柳书记的身体不佳,怕影响他休息,我们便告辞了。这是我第四次与柳书记的接触,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作者简介:周文敏,1928年生于陕西省长安县鸣犇镇柳村。1949年6月参加工作,同年10月入党,在长安县工作四十年。曾任大兆、王曲区委副书记、书记,县文化科副科长,县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县贫协办主任,区工委副书记,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县政协秘书长、统战部调研员等职务。1989年以正处级调研员身份离休。

图为作者青年时期在农村基层工作。

可以找老领导请示请教,到王曲工作后才

知道柳书记早都不在那里住了。在王曲工作期间,每次路过皇甫坡时,就想起柳书记,不由得驻足北望。柳书记原来住的地方就在皇甫坡的北边不远处,只要向北一望,就隐约可见。有一次因工作和冯继贤同志(王曲公社副主任、《创业史》中皇甫乡党支部书记的原型)去罗家湾,走到柳青书记住地地边,我便提议去看看柳书记曾经住过的地方,冯继贤同志说,柳书记早都不在那里住了,连房都被拆了。此情此景,我就不由得想起了1962年,和郭景宇同志看望柳书记的情景,刹那间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不觉眼里含满了泪水。

1977年,我被调任去王曲区工委副书记。区委武装部长李学义是贾里村人,在王曲工作时间长,也熟悉柳书记,常和我谈起柳书记。一天,我对李学义同志说,我想见一下柳书记,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李学义说,听说柳书记有病,在西安市第二干休所休养。商量后,我们骑着自行车找到住在韦东韦村的西安市第二干休所。柳书记住在干休所的二楼,有保姆陪护。见到柳书记,我既喜又惊,喜的是多年未见,终于见

柳书记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事迹也一直为人们所传颂。柳青是一位大作家、模范共产党员,也是一位好领导。他的高尚品德、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典范。

《创业史》出版后,柳书记送了一本给我,上面还有他的签名,我将这本书读后,藏在农村老家。大儿子周养俊上小学的时候发现了,他就爱上了这本书,经常阅读,从此他也知道了柳青。在柳青精神的启示下,走上了文学之路。二儿子周旭在二十世纪70年代知青插队时,就选择了柳青《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德胜所在的生产队——皇甫公社胜利大队。在那里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常和王家斌接触、请教,听王家斌讲《创业史》和柳青的故事。后来,周旭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学习期间,他以皇甫村的见闻为素材,创作了系列粉画《蛤蟆滩的蛙声》。本科毕业后,又继续潜心作画,获得过许多奖项。

从两个孩子的成长来看,也是学习柳青精神所取得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家也是学习柳青精神的受益者。 □周文敏



单腿跳

席王村的高跷

席王村位于汉长安城遗址北城墙根,隶属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管辖,有着400年的建村史,现有566户1910人。在古城西安流传着这样口头语:“大白杨的社火,席王的腿。”意思是社火要数大白杨的好,柳木腿(高跷)要数席王村的最好。席王村高跷俗称“柳木腿”,远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席王村就有在传统节日耍社火、踩高跷(柳木腿)的习俗。

席王村的高跷以高、惊、险著称。他们利用柳木(主要是水曲柳)韧性好的特点,制作成2-2.45米的高跷,故称柳木腿。村上几乎家家都备有柳木腿。村委会现存有2.45米高的柳木腿4副,普通柳木腿2米的70余副。席王村酷爱高跷,参加表演的上有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下有五六岁的小孩。一到农闲季节,就绑上高跷在麦田里练功,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的人连吃饭都不解掉柳木腿。练功者还到河边、井台、土壕等高难度地段苦练,从一米高的楞坎上跳上跳下,就这样练习一个冬天。

席王村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是村上的古庙会。古庙会上,高跷表演是重头戏。前一天即正月二十二日下午,演员要先祭拜风神,以祈求表演时不刮大风。再到村东的三王(牛王、马王、药王)庙祭拜,最后到村西头的无量庙祭拜。农历正月二十三,演员们凌晨5点起床,洗漱后吃饭(带肉的好饭),不能喝水,以免演出过程中要上卫生间。9点开始画脸谱,并穿上戏装。10点开始演

演,仗仗队一马当先,锣鼓队鼓舞翩翩,社火表演紧跟其后,高跷表演掀起高潮,阵容庞大,浩浩荡荡,十分壮观。社火表演队伍里的大头娃娃、狮子绣球、穿蟒袍的牛老爷、逗人笑的驴大姐等,边走边演,人群笑声不断。最后压轴的高跷表演外人难得一见,踩着柳木腿的演员,扮着《杀狗劝妻



独杆轿

会”改为“未央区汉长安席王村高跷协会”,协会除了保留传统的剧目外,还增加了《鸿门宴》《萧何月下追韩信》《十面埋伏》《霸王别姬》等母目的表演。

2015年,席王村高跷(柳木腿),已成为未央区“非遗”项目。 □张鹰



顶台灯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手稿

看惯了规矩整齐的印刷文字的读者或许都有这样的好奇,在成书之前,作家在稿纸上会留下怎样的笔迹?是娟秀规矩的,还是潦草奔放的?是一气呵成的,还是反复涂抹的?手稿中留下了哪些隐秘的痕迹和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手稿展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接触作家笔迹的机会,揭开了一部作品最初形成时的神秘面纱。

回望手写时代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回望手写时代——馆藏80年代手稿展”展厅,刘心武、高晓声、舒婷、汪曾祺、巴金、张洁、莫言、张承志、刘震云等知名作家上世纪80年代的手稿瞬间将观众带回了那个电脑写作尚未普及的手写时代。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尚未改革开放的中国产生了巨大轰动,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和80年代文学的前奏,这部手稿安排在本次手稿展的开端位置。面对40多年前,墨迹已经渐渐淡化的手稿,观众不禁仁立沉思,想象作家当年一笔一划写下这部文学史名篇时内心的紧张与冲动。

1985年,莫言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这篇作品被张洁视作天才作

钩沉

手稿时代终结了吗?

家诞生的信号。与后期莫言的笔迹不同,细心的读者发现,这部手稿有点像黑板报上的美术字。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介绍说,这确实是莫言的笔迹,他曾在连队当过通讯员,那时候的字体是写过黑板报写出来的,和现在的笔迹出入很大不足为怪。

除了作家笔迹外,有些手稿上还留有编辑的笔迹。手写时代的编辑工作与今天不同,很多编辑都是在作家手稿上直接修改。不少手稿上还留有排版信息,这些排版信息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铅印时代的出版流程。

手稿的多重价值

保护利用展示好作家手稿,对文学爱好者直观了解作家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手稿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日益受到关注。

何为手稿?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陈漱渝介绍说:“手稿是作者手写的原稿,具有一定完整性,与‘手迹’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任何亲笔书写的痕迹都是手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认为:“手稿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前者指的是作品手稿,后者还涵盖了书信、日记、公文、题跋等作家的各类文字。作为文本生成的第一关和最初环节,手稿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

日前,国际学界手稿研究视野不断扩大,“涵盖书法、绘画、手迹,以及出版校样,甚至手工制作的艺术品,版画、雕塑、篆刻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主任王锡荣介绍说。

近日,新版《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集分卷主编之一、东北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中心主任徐强说:“新全集较师大版多收的238封书信,绝大多数是据新征集到的原始手迹整理出来的,包括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的汪曾祺致邓友梅、萧乾等人的信件。另有汪曾祺于1985年访港期间所作的演讲《寻根》,依据手稿收入《全集》,为理解他与寻根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文献。”可见,手

稿在编辑文集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原初手稿,相对于其后所有版本而言,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第一‘祖本’,具有不可取代的文献价值。”徐强说。

“手稿大体上有三种形态:草稿本、清稿本(包括作者助手的誊清稿本)和上版付印时‘齐、清、定’的上版稿本。”陈漱渝说。作为底本,手稿是订正错讹的依据。徐强提到了一个例子:汪曾祺小说《戴车匠》中,“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工作间,是叫人感动的”经手稿本校勘发现当为“一个人走进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动的”,编辑臆测擅改一个字,导致意思南辕北辙。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符杰祥认为:“手稿与各种印刷本的比对校勘,不仅可以辨优劣、定是非,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与阅读文本,给深化文学研究提供无可替代的重要学术资源。”他提到,《阿Q正传》中,“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一句,手稿残页为“在柜上一扔,说”。鲁迅未做修改涂抹。在《晨报副刊》发表后,各印刷版本均缺少逗号,阿Q举止之间的骄傲之气失色不少。

手稿保留着作家的性情情感与生命体温,字体、笔画,甚至笔迹浓淡都具有阐释解读的空间。陈子善说:“《鲁迅手稿全集》收录了鲁迅写给内山丸造的一封信,内容为让书店老板留一本书给他,笔墨渐次变淡,中间没有蘸墨,反映出作家书写时的迅速随意,并非斟酌再三。”

一些作家的手稿还是书法精品,具有审美价值。在徐强眼中,汪曾祺擅行书,走笔流暢、风格飘逸,衰年变法,常参以篆隶笔法,走瘦硬一路,结体往往奇崛夸张,率性而作。前后期手稿,反映了作者书法风格的变化。书写美学是作家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研究作家美学风格的重要参照。

尽管手稿能够解读出丰富的信息,具有多重价值,一些学者也坦言,手稿研究并不那么容易。“手稿整理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对研究者素质有多方面要求。需要对书法史论、各体书法特别是行草书字形、字体

变迁、作家行实及审美心理、书写习惯、书写背景都比较熟悉,非有丰富经验者难以胜任。”徐强说。

目前,手稿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问——“手稿学”,涉及版本校勘、修辞艺术、写作技巧、作家心态、文化语境、书法美学等方面。符杰祥说,“法国学者桑德琳·马钱德认为,‘手稿学重新发明一种全新的语言,反反覆覆,上下求索,重视的是写作的痕迹,而非华丽的文藻’,现代手稿学关注文本创作的生成痕迹,试图触碰一些作家不愿示人的创作隐秘。”给别人看自己的手稿就如同一个没有化妆的女人出现在公众场合。”

作家“换笔”之后

1994年,作家陈大超买了一台电脑,他写道:“从此,我就告别了在纸上改稿子改得一塌糊涂的心烦和抄稿抄得人恶心想吐的痛苦。在电脑上写得多好啊,一个个的字,就像珍珠一样从指缝里蹦出来,给人一种珠圆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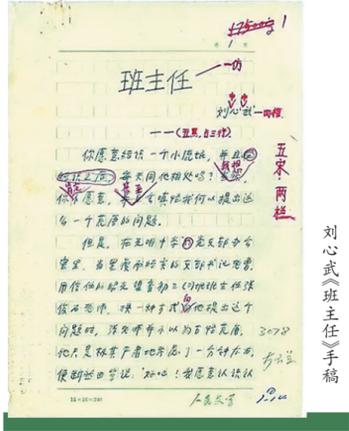
润、赏心悦目的感觉。”这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作家的心声。

其实,早在百年前,国人已经开始换笔——毛笔换为钢笔。鲁迅在《论毛笔之类》中谈用毛笔还是钢笔写作时说:“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20世纪90年代,近代以来第二次大规模换笔开始了。用电脑写作的好处显而易见,修改增删十分便捷,写作效率大大提高;适应打字后,爬格子的体力活也变得十分轻松,笔耕墨种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在好处之外,电脑写作也使文字书写甚至辨识变得生疏。徐强说:“长期用电脑写作容易导致书写能力退化,我提倡作家们尽可能恢复、保持一些手写的习惯,我相信这有助于保持和母语文字之间更为深刻、更富质感的血肉联系。”电脑写作也没有了手写的审美价值,陈漱渝对此感到遗憾,他认为:“在鼓励作家换笔的同时,也该鼓励有书法造诣的作家留下一些亲笔书写的原稿。”

新增手稿越来越少,对手稿研究与新文学史料搜集的影响不言而喻。在电脑写作时代,除非作者刻意保留,修改痕迹很难保存下来,实物手稿研究之外,电脑写作痕迹研究成为前沿课题。

尽管新增手稿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收藏市场上,手稿拍卖却如火如荼。2014年,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手稿以1207.5万元高价拍出,并登上官司。一些作家开始重拾手稿,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还在坚持手写,作家的手稿保护意识明显增强。那么,手稿时代是否真的会终结?青年作家徐则臣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王城如海》是手写而成的。“出差在外,携带纸笔更加方便,我喜欢笔走在纸上的感觉,文字更有身体性和血肉感”,徐则臣说,“我认为手稿时代不会终结。只要还有人对于汉字这种象形文字之美充满好奇,只要作家还愿意对文字的身体性有更深入的体认,手稿就会继续存在。文字不该被过度工具化,我愿意和文字继续保持一种手工关系。” □张鹏禹



刘心武《班主任》手稿